

叶祖孚文史散文集

叶祖孚 著

北京出版社

书 名:叶祖孚文史散文集

作 者:叶祖孚

出 版 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ISBN 7-200-04685-X/I267

定 价:31.00

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

谢 冕

那一年十月，中国的天空响起了惊雷。雷声把人们唤醒，他们迎着秋天的阳光，擦干眼中的泪水和身上的血迹，告别十年噩梦，开始了新生活的追求和梦想。这十年的苦难太沉重，也太惨烈，人们都在考虑如何结束过去，创造未来。政治家们有他们雄心勃勃的事要做，他们在筹划着创造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与过去任何时期相比都不逊色的伟大的工程。在最先醒来的人们中，有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的文学家们——包括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以及默默奉献的文学编辑家们在内的全体文学工作者——他们也隐约地感到了特殊时期对于文学重建的召唤，也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对于这一庄严事业的悄悄的激动。

北京历来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一份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在 20 世纪 70 年代那场巨大灾难落幕之后诞生了。刊物赶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个划时代的会议之前创刊，它是一个时代开始的象征，更像是一个传送信号的气球，向久经苦难的人们预告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这就是《十月》。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从昨日的阴影走出来，人们已不习惯满眼明媚的阳光，长久的精神囚禁，人们仿佛是久居笼中的鸟，已不习惯自由地飞翔。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条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许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因为长久的荒芜和禁锢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所形成的欣赏与批评的惰性，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那严阵以待的左倾思维的弹雨和雷阵，都要面对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的欣赏惰性的自我折磨。

十月的阳光是明媚的，但十月的秋风又有些让人感到了寒气的逼近。但毕竟，文学已经听到了时代的潮水在远方涌动的声音。《十月》一旦选择了

诞生，它就不打算停止自己的脚步。哪怕遍野荆棘，它也要滴血前行。刊物出版的第二年，就有一场关于《飞天》的遭遇战。一个以饥荒和动乱为背景的爱情，受到了强暴。作品第一次涉及了对于“文革”、高级干部滥用权力以及腐败的揭露，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这段故事已成过去，20余年后抚今追昔，不能不惊叹作者和编者的睿智和胆识。当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成了一则起于青萍之末的风的预言，它的警策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文学原是社会良知的一盏明灯，它又是社会病变的显微镜，有时甚至也能成为一副杀菌剂。为了这种目的，它往往要付出代价，但亦在所不惜。

在难忘的岁月里，在我们的心灵中，永远镌刻着那披着长巾凌空起舞的美丽的女神的形象。艺术匠师们凭借着他们非凡的想象力，让飞天在自由的天宇中翱翔。她是苦难的见证，也是人间真情的见证。就这样，刊物在思想解放的大时代里，以勇敢而机智的姿态追求并创造着，迎接艺术解放的大时代的到来。它以自己骄人的业绩，而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勇猛的先行者和崇高目标的实践者。

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结束，中国文学进入了伟大而辉煌的80年代。中国文学满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它已经预感到一个文学的新时代的到来，而且正以充盈的浪漫情怀，以自己坚定、勇敢和创造性的劳动去迎接这个时代。一方面是要修复文化虚无主义和“新纪元”论造出的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以及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断裂，一方面是要修复与一切外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学传统的断裂。这从1978年8月出版的第一期刊物所设置的“学习与借鉴”栏目即可看出。在这与千万读者初次见面的时候，《十月》刊登了鲁迅的《药》、矛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以及都德的《最后一课》，并分别佐以欣赏分析的文章。编者“接续”传统的意图非常明显。那时，长久的与世隔绝，造成的视野的闭塞，观念和方法的陈旧，使当日的中国文学家个个都成了饕餮之人。他们饥不择食，贪婪地吞食一切，以弥补长久的文化饥饿。

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复兴”，就这样在修复与传统的断裂以及引进新知的大背景下展开了。他们心照不宣，有着一个宏阔的计划，即要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使中国文学夺回失去的时间并开始正常的运行。在文学做梦的年

代，《十月》也是一份引人注目的走在前面的刊物。至今人们阅读它当日发表的那些文字，依然难以抑制那种发自内心的激动。人们很难忘怀那个晚霞消失的时候，在泰山极顶庄严绮丽的夜色中所进行的那场劫后重逢的对话。深重的悔恨和自省，激情的燃烧及退潮，经历历史沧桑的人们，在落日的余辉中把灾难的记忆留在了身后，憧憬着更加理性、更富哲理的人生，那时节——

只见火红的夕阳正悬挂在万里云海上，开始向天空投射出无比绚烂的光辉。青色、红色、金色、紫色的万丈光芒，像一面巨大无比的轻纱薄幔，在整个西部天空舒展开来，把半个天穹都铺满了——这光轮在进入云涛之前，骄傲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辉，把整个天空映得光彩夺目，使云海与岱顶被全部镀上了一层金色。

这是一场庄严的告别，更是一场伟大的迎接，迎接那经历了阵痛之后的更加辉煌的日出。“许多只能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已经随着这一个时代的过去而永远地过去了”。也许没有过去的是那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记忆带来的悔恨与彻悟。整个 80 年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学都沐浴在这样一片十月给予的激情之中。《十月》没有辜负诞生了它的时候，它勇敢而智慧地穿越险象丛生的开阔地，绕过一丛又一丛可能触雷的榛莽，而把文学的争取和希望留给了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新时期。不是没有痛苦，也不是没有欢乐，而是在痛苦的反思之后迎接了文学复兴的欢乐。那一切是多么难忘，当我们那变得澄澈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只雁，三只，五只，终于组成了雁阵，“雁阵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的文字，在苍穹上写了一个铺天盖地的‘人’字”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这伟大的争取和觉醒而自豪。

那时的空气中弥漫着这种纠结着痛苦的挣扎最终而赢得欢乐的氛围。正如如下一段文字所揭示的“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到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个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终是光明的。因为这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

喊中被淹没。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刊物的编者辛勤地工作着，艰难地进行着。那些饱含着时代反思精神的作品，一篇一篇从这里走向社会。那些作品传达着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和思考，从对动乱年代的追忆和批判，到呼唤人性的复归，从苦等来车的没有站牌的车站，到艰难起飞的深重的翅膀，《十月》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清楚地记得，在瑶山深处有一座爬满青藤的木屋，那里住着一位青春美丽的瑶家女子，由于密林深处透进了一线明亮的阳光，她终于结束了与世隔绝的封闭，萌醒了对于健康、自由生活的向往。那里后来演出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悲剧，人们至今还为那个女子的命运悬心。这说明通往光明的道路漫长而艰辛。而《十月》为此做出了郑重的承诺。

这一份诞生于黑暗与光明际会时节的刊物，从它出刊的那一天起，就把表现和讲述时代盛衰、万家忧乐当成是自己的庄严使命。它记载着当代中国人的泪水和血水，它尽情地抒写着深重苦难带来的悲哀，以及灾难结束之后的欢愉。它是新时代诞生的第一声呼喊。社会接受并认可了它。这从刊物的发行量一路攀升即可看出，从1978年始刊发行10万册，到1980年底已接近24万册，到1981年，最高印数达58万5千册。1981年到1983年间，因为印量激增，邮运量过大，不得不安排在北京、湖北、四川三地同时印刷发行。三年中，平均印数都在40万册以上。一本文学刊物能够获得这么巨大的发行份额，只说明读者需要它，它和读者的心是贴近的。具体一些说，是由于刊物能够不断地推出引起社会广泛共鸣的作品。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篇小说评奖为例，第一届获奖作品共15篇，《十月》占了5篇，为总数的三分之一，第二届、第三届各为20篇，《十月》分别为5篇和4篇。这数字很说明问题。

《十月》走在当年思想解放潮流的前面，也走在艺术解放潮流的前面。要是《十月》只有领先于时代的思想领悟，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丰富而新颖的艺术表现力，它最终也会失去读者。现在反观当年，在那些引发广泛关注的作品中，的确也存在着艺术粗糙，或者表达过于直露等缺陷。言之不文，行之不远。那些艺术粗糙的作品，即使轰动一时，也不会保留下来。发表在《十月》并获得佳评的那些作品，不仅记载着一个时代思想所达到的深度，

也记载着一个时代艺术所达到的精度。

有一部或两部作品，最先向话剧的创造和演出，发出了艺术变革的“绝对信号”，那里有面临窘境的青年人的沉沦、彷徨和追求，也有在车站徒步出发的独行者。还有一部作品，最先倡导了小说叙事的创新，在那里，主人公30年的升降浮沉，幻成了一只蝴蝶的梦，但最终，作者说“不管你飞得多高，它来自大地和必定回到大地，无论是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这些作品记载着一个时代文学进行的路径，它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全部艰辛和辉煌。也许这一切都说明着如今出版《十月》典藏版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的文学刊物，在沐浴21世纪曙光的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影视屏幕和休闲刊物夺去了为生活奔波的人群的大部分剩余时间，纯文学很难使少有闲暇的人们静下心来，品尝精致的文艺作品。而市场运作和传媒导引的结果又夺去了相当数量的读者。在创作方面，由于经济等因素的考虑和诱惑，应时的和随众的动机，也使一些作家失去了耐心和毅力。文章为时而作，作品为世所用，这样的价值观在一些作家那里受到了冷漠甚至调侃。文学的时尚化仿佛是一场迅速蔓延的传染病，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正在可悲地沦为快餐和软饮料。

这是一场相当严峻的考验。但在困境之中，《十月》的旗帜仍在高高飘扬，它的发行量仍稳居中国原创文学期刊的鳌头。《十月》靠什么持久赢得读者如此的青睐？它决胜的秘密在那里？这是我们萌起出版典藏品丛书念头的动因。这部丛书囊括了《十月》1978年创刊至2000年间发表的最优秀作品，我们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珍惜我们曾经进行过的努力。回顾我们曾经拥有的艰难和克服艰难之后的欢乐，由于我们曾经尽心尽力，我们的工作曾给人们带来震撼——因为这些作品体现了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的关注，文学成为希望和追求的象征。文学有自己的传统，那是无数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编辑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所积存的经验的延伸。这种血脉不会断绝。我们坚信，在某一个时期，由于某一种机遇，文学和时代会再一次磨擦，重新生发出耀眼的火花。这就是我们的祝祷和期待。

2003年12月1日，完稿于北京大学

注释：

见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原话是：“从主观方面看来，只有音乐才能引起人的音乐的感觉；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对于它，音乐并不是一个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某一种本质力量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 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北京第一版，第204页。

出处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载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原文是：“我们应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南珊对李怀平说的话。见《十月》1981年第1期。

见张承志《北方的河》，文前题记。《十月》1984年第1期。

见王蒙《蝴蝶》。文中说：“这个故事不应该是庄生梦见蝴蝶，或者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生。它应该是一条耕牛梦见自己成了拖拉机，或者一台拖拉机梦见自己成了耕牛。在生活里飘飘然和翩翩然实在少见——它有一种结实的、沉重的感觉。”《十月》1980年第4期。



1978 年，十年浩劫后的中国第一家
大型文学期刊问世

书的梦	孙 犁 2
牛棚小记	丁 玲 9
魂牵梦萦记 《海魂》	赵 丹 21
热土	宗 璞 32
生死场，艰辛路	骆宾基 37
“黄和平”散曲	凤 子 51
她第一个向我打开了文学之门	荒 煤 57
棣花	贾平凹 65
荒原的路	艾 青 72
花的九重塔	唐 敏 85
认字求学记	新凤霞 92
萝卜	汪曾祺 109
可以溶解的鱼	王开林 116
珍贵	刘烨园 121
汉城纪行	林 非 126
清洁的精神	张承志 138
通州怀往	张中行 151
四十而惑	陈平原 163
闲散的日子	赵 园 179

目 录

它们	周晓枫 186
说不完的维也纳	谢 冕 197
诗化西藏	马丽华 206
棕皮手记	于 坚 215
煌煌上庠	卞毓方 229
记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杨 绛 242
乘沙漠车记	雷 达 247
上帝的沙地	张锐锋 256
爸爸	王小妮 282
李準自述	李 準 299
夏公来信	袁 鹰 310
台游随笔	季羨林 324
风雪兼程去“卖艺”	舒 婷 350
北塔山随笔	周 涛 363
澳门一瞥	李兰妮 375
无边无际的眩晕	曹文轩 394
斯多法赫先生的花园	郭宏安 408
飘逝的绝唱	李存葆 420



孙犁，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49年后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四、五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荷花淀》、《山地回忆》，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文艺理论《文艺学习》，评论集《文学短论》等。

到市场买东西，也不容易。一要身强体壮，二要心胸宽阔。因为种种原因，我足不入市，已经有很多年了。这当然是因为有人帮忙，去购置那些生活用品。夜晚多梦，在梦里却常常进入市场。在喧嚣拥挤的人群中，我无视一切，直奔那卖书的地方。

远远望去，破旧的书床上好像放着几种旧杂志或旧字帖。顾客稀少，主人态度也很和蔼。但到那里定睛一看，却往往令人失望，毫无所得。

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这种梦境，实际上是幼年或青年时代，残存在大脑皮质上的一种印象的再现。

是的，我梦到的常常是农村的集市景象：在小镇的长街上，有很多卖农具的，卖吃食的，其中偶尔有卖旧书的摊贩。或者，在杂乱放在地下的旧货中间，有几本旧书，它们对我最富有诱惑的力量。

这是因为，在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他们出卖各种石印的小说、唱本。有时，在戏台附近，还会遇到陈列在地下的，可以白白拿走的，宣传耶稣教义的各种圣徒的小传。

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天华市场有两家小书铺，出卖一些新书。在大街上，有一种当时叫做“一折八扣”的廉价书，那是新旧内容的书都有的，印刷当然很劣。

有一回，在紫河套的地摊上，买到一部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是商务印书馆的铅印大字本，花了一块大洋。这在我是破天荒的慷慨之举，又买了二尺花布，拿到一家裱面铺去做了一个书套。但保定大街上，就有商务印书馆的分馆，到里面买一部这种新书，所费也不过如此，才知道上了当。

后来又在紫河套买了一本大字的夏曾佑撰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后来的《中国古代史》），也是商务排印的大字本，共两册。

最后一次逛紫河套，是一九五三年。我路过保定，远千里同志陪我到“马号”吃了一顿童年时爱吃的小馆，又看了“列国”古迹，然后到紫河套。在一家收旧纸的店铺里，远买了一部石印的《李太白集》。这部书，在远去世后，我在他的夫人于雁军同志那里还看见过。

中学毕业以后，我在北平流浪着。后来，在北平市政府当了一名书记。这个书记，是当时公务人员中最低的职位，专事抄写，是一种雇员，随时可以解职的，每月有二十元薪金。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旧官场、旧衙门的景象。那地方倒很好，后门正好对着北平图书馆。我正在青年，富于幻想，很不习惯这种职业。我常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到北新桥、西单商场、西四牌楼、宣武门外去逛旧书摊。那时买书，是节衣缩食，所购完全是革命的书。我记得买过六期《文学月报》，五期《北斗杂志》，还有其他一些革命文艺期刊，如《奔流》、《萌芽》、《拓荒者》、《世界文化》等。有时就带上这些刊物去“上衙门”。我住在石驸马大街附近，东太平街天仙庵公寓。那里的一位老工友，见我出门，就如此恭维。好在科里都是一些混饭吃、不读书的人，也没人过问。

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偏院的西房。这个屋子里最高的职位，是一名办事员，姓贺。他的办公桌摆在靠窗的地方，而且也只有他的桌子上有块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一位办事员，姓李，好像和市长有些瓜葛，人比较文雅。家就住在府右街，他结婚的时候，我随礼去过。

我的办公桌放在西墙的角落里，其实那只是一张破旧的板桌，根本不是办公用的，桌子上也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桌子两旁，放了两条破板凳，我对面坐着一位姓方的青年，是破落户子弟。他写得一手好字，只是染上了严重的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睡醒了就和我开句玩笑。

那位贺办事员，好像是南方人，一上班嘴里的话是不断的，他装出领袖群伦的模样，对谁也不冷淡。他见我好看小说，就说他认识张恨水的内弟。

很久我没有事干，也没人分配给我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东人，为人诚实，他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好，等科长来考勤，对我很不利。他比较老于官场，他说，这是因为朝中无人的缘故。我那时不知此中的利害，还是把书本摆在那里看。

我们这个科是管市民建筑的。市民要修房建房，必须请这里的技术员，去丈量地基，绘制蓝图，看有没有侵占房基线。然后在窗口那里领照。

我们科的一位股长，是一个胖子，穿着蓝绸长衫，和下僚谈话的时候，老是把一只手托在长衫的前襟下面，作撩袍端带的姿态。他当然不会和我说

话的。

有一次，我写了一个请假条寄给他。我虽然看过《酬世大观》，在中学也读过陈子展的“应用文”，高中时的国文老师，还常常把他替要人们拟的公文，发给我们当作教材。但我终于在应用时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错了。听姓石的说，股长曾拿到我们屋里，朗诵取笑。股长有一个干儿，并不在我们屋里上班，却常常到我们屋里瞎串。这是一个典型的京华恶少，政界小人。他也好把一只手托在长衫下面，不过他的长衫，不是绸的，而是蓝布，并且旧了。有一天，他又拿那件事，开我的玩笑，激怒了我，我当场把他痛骂一顿，他就满脸赔笑地走了。

当时我血气方刚，正是一语不合拔剑而起的时候，更何况初入社会，就到了这样一处地方，满腹怨气，无处发作，就对他来了。

我是由志成中学的体育教师介绍到那里工作的。他是当时北方的体育明星，娶了一位宦门小姐。他的外兄是工务局的局长。所以说，我官职虽小，来头还算可以。不到一年，这位局长下台，再加上其他原因，我也就“另候任用”了。

我被免职以后，同事们照例是在东来顺吃一次火锅，然后到娱乐场所玩玩。和我一同免职的，还有一位家在北平附近的人，脸上有些麻子，忘记了他的姓。他是做外勤的，他的为人和他的破旧自行车上的装备，给人一种商人小贩的印象，失业对他是沉重的打击。走在街上，他悄悄地对我说：

“孙兄，你是公子哥儿吧，怎么你一点也不在乎呀！”

我没有回答。我想说：我的精神支柱是书本，他当然是不能领会的。其实，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为这个职位，实在不值得留恋。另外，我只身一人，这里没有家口，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老家喝粥去。

和同事们告别以后，我又一个人去逛西单商场的书摊。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一书，已经陈列在那里了。用同事们带来的最后一次薪金，购置了这本名著，高高兴兴回到公寓去了。

第二天清晨，挟着这本书，出西直门，路经海淀，到离北平有五六十里路的黑龙潭，去看望在那里山村小学教书的一个朋友。他是我的同乡，又是

中学同学。这人为人热情，对于比他年纪小的同乡同学，情谊很深。到他那里，正是深秋时节，黄叶飘落，潭水清冷，我不断想起曹雪芹在这一带著书的情景。住了两天，我又回到了北平。

我在朝阳大学同学处住几天，又到中国大学同学处住几天。后来，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内容是：我要离开这个大城市，回到农村去了。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

诗被采用，给了五角钱。

整理了一下，在北平一年所得的新书旧书，不过一柳条箱，就回到农村，去教小学了。

我的书籍，一损失于抗日战争之时，已在另一篇文章中略记，一损失于土地改革之时。

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按照当时党的政策，凡是有人在外参加革命，在政治上稍有照顾。关于书，是属于经济，还是属于政治，这是不好分的。贫农团以为书是钱买来的，这当然也是属于财产，他们就先后拿去了。其实也不看。当时，我们那里的农民，已普遍从八路军那里学会裁纸卷烟。在乡下，纸张较之布片还难得，他们是拿去卷烟了。

这时，我在饶阳县一个小区参加土改工作。大概是冀中区党委所在之地吧，发了一个通知，要各村贫农团，把斗争果实中的书籍，全部上缴小区，由专人负责清查保存。大概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吧，我们的小区区长，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

书籍也并不太多，堆在一间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一些古旧破书，可以用来卷烟的已经不多。我因家庭成分不好，又由于“客里空”问题，正在《冀中导报》受到公开批判，谨小慎微，对这些书籍，丝毫不敢染指，全部上缴县委了。

我的受批判，是因为那一篇《新安游记》。是个黄昏，我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绕了绕，那里地势很洼，有些雾气，我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回去仓促写了一篇抗日英雄故事，在《冀中导报》发表了。土改时被作为“客里空”典型。

在家乡工作期间，已经没有购买书籍的机会，携带也不方便。如果能遇到书本的话，只是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但也有时得到书。我在蠡县工作时，有一次在县城大集上，从一个地摊上，买到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精装的《西厢记》。我带着看了一程子，后来送给蠡县一位书记了。

《冀中导报》在饶阳大张岗，设立了一处造纸厂。他们收买一些旧书，用牲口拉的大碾，轧成纸浆。有一间棚子，堆放着旧书。我那时常到这家纸厂吃住。从棚子里，我捡到一本石印的《王圣教》和一本石印的《书谱》。

在河间工作的时候，每逢集日，在一处小树林里，有推着小车贩卖烂纸书本的。有一次，我从车上买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一直保存着，进城后，送给新婚燕尔、出国当参赞的一位同志了。

(发表于 1979 年第 2 期)